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一二九运动



1935年末，在祖国濒临危亡之际，北平的爱国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场运动和运动中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对推动抗战和动员青年学生参加抗战，起过巨大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空前的光辉发展。这场运动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从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示威，中经成立骨干组织民先队，到“三·三一”反压迫的抬棺大游行，这是发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阶段；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贯彻党的正确政策，到抗战爆发，是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军政和社会各界共同抗日的第二阶段；从北平沦陷后平津学联和民先队组织学生参加敌后抗战和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到1938年国民党政府镇压群众运动，运动改变发展策略，这是第三阶段。把“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下来，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人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材。

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5年秋，对中国人民来说，确实是一个“是生存还是死亡的”时节。

四年前的1931年，当日本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的一纸不抵抗手令，不但使东北三千里江山沦陷敌手，而且使正值初生牛犊的张学良少帅，至今还背有有负国家的愧疚。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踵陆军之后，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当十九路军孤军浴血奋战时，国民政府却发表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错误主张。以当时的局面而言，一面抵抗的这一“面”，实际是大而无当的外交辞令，而一面交涉的这一“面”，却做得很好：5月，国民政府即同日本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的签署，无疑使在关外虎视眈眈、准备越过长城的日本陆军更加有恃无恐。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了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后，即向张北的长城各口进攻。守卫长城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的爱国热情，却被蒋介石的“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命令所扼杀。5月下旬，日军越过长城，北平、天津陷入日军包围之中。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依然妥协。1934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代表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7月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了卖国的《何梅协定》，给日本控制华北和平、津打开了方便之门。1935年11月，国民党冀东专员殷汝耕公开投敌，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也加快了搞“华北特殊化”的步骤，北平已处在沦亡的边缘。

国土沦丧的局面，震撼着中华民族的心灵。“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号召全国人民肩负起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在挥师北上抗日的同时，并表达了与国民政府携手合作的民族大义。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行动和主张，在寻求抗日救亡之路的广大人民群众中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地处国防前线北平、具有政治敏感的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从红军的北上抗日和“八一宣言”中，不但进一步认识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而且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

1935年夏秋，华北地区发生了黄河大水灾。9月，北平学生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清华牛荫冠、师大杜润生等同学携带捐款和抗日宣传品到灾区慰问。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各校抗日爱国活动的发展，把国民党搞垮了的学生组织，逐渐地恢复或建立起来了。

11月1日，燕京、清华、女一中等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发出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表达了广大学生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宣言》中说：“‘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藉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宣言》呼吁国民党政府，“诚以国势如此，凡属国民，分应共肩负责，奋起救存。”

在这期间，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有彭涛、谷景生、周小舟），在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长青的直接领导下，不失时机把水灾赈济会组织转变为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成员是彭涛、周小舟、谷景生），负责人有郭明秋、姚依林、董毓华、黄华、孙敬文、邹鲁风、高惠如等，统一领导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不久，北平的爱国学生，发动了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揭开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

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35年11月下旬，北平学联党团的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和学联的郭明秋、姚依林、董毓华、黄敬等，多次举行秘密会议。他们在认真分析了形势和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后，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11月26日，国民党行政院任命何应钦为驻北平办事处长官，他们决定借此机会，向何应钦请愿，表达华北学生的抗日救国决心。

12月3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会议，通过了《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评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项议案。各校代表根据议案，发动骨干分子，通过学生自治会，投入了紧张的动员准备工作。

清华大学当时党支部有党员蒋南翔、牛荫冠、吴承明和何凤元等，蒋南翔是书记，这是清华的领导核心。11月27日，清华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学联请愿游行的提案。由于右派学生捣乱，提案未能通过。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华北就要沦亡的威胁下，12月8日，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主持大会的左派代表人物黄诚、陆瑾，中派代表陈元，右派代表司徽，会前有了协商，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全体学生参加游行示威的决议。清华原来就有合法的学生会，在此基础上又专门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并立即发表了救国宣言，说出了北平学生的心里话：“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又发通电，请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人民投身抗战。这时，学联得知“冀察政

务委员会”将在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后，便决定在这一天举行大规模的救国请愿活动。

12月7日，学联在女一中又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到会的有二十几所学校的代表，会上对请愿游行的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等，做了具体的安排。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队进城；两支队伍在西直门汇合后，沿途再发动那些尚未行动起来学校。

布置妥当后，代表们虽然热情高涨，但对游所请愿能否成功还是有点担心。当有人提出“不到八百人是否可以取消游行”时，彭涛回答说：形势到了，就像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烧起熊熊大火来。他提出，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要由那些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首先上街，造成声势，然后就可以到进步力量较弱而又被学校当局严密控制的学校进行动员，喊他们出来参加游行。会后，各校代表把9日的行动计划带回学校，分头动员。

燕京大学代表黄华返校后，立即与学生自治会的同学摊开地图，研究各校向新华门进发的路线，并组织了交通队和纠察队。为了不走漏风声，在8日晚9时才敲钟召集全体学生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学联的决定。

清华也在8日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组成了队伍。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学院……也都以同样的心情，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在学联所在地的女一中，8日晚，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孙敬文等人又碰头，检查准备情况，并作了分工；黄敬随队伍指挥，姚依林、郭明秋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指挥和联络；游行队伍在11时到新华门请愿，此后游行到天安门汇合。

爱国学生的革命热情，像久被压抑的火山，在古老的北平城迸发了！

三、抗日救亡的风暴

1935年12月9日，虽然警察当局事先得知了学生游行请愿的消息，清晨就下了全城戒严令，并派警察堵住了城内外许多学校的大门，在一些街道路口布置了岗哨，但是，在中共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领导下，游行请愿的学生们还是按预定计划积极行动起来了。

清华在城外30里，为了能及时赶到集合地点，同学们在早晨5点多钟就起了床，沿着平绥铁路，向西直门进发。8点钟左右，清华的队伍和燕京大学的队伍汇合，在半路上还有城外的弘达中学、成达中学等100多名同学参加。但是，到了西直门却进不了城。

原来，在队伍到高粱桥时，北平当局根据西郊警察署长林雁宾的报告，已将西直门关闭。西直门城楼上下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宪兵、警察和二十九军的士兵。为了能与城内的请愿队伍及时汇合，学生们派出代表与军警进行交涉，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领队决定留下两个分队在西直门向居民进行抗日宣传，其余的队伍奔向阜成门，可是，阜成门也关闭了，又转到西便门，还是如此，就又返回西直门。在凛冽的寒风中，向城区周围的居民和守城军警展开宣传，北平大学农学院的二三十位同学赶来声援，一直坚持到傍晚时分。最后，按照指挥部的决定，由清华女生陆瑾站在高凳上向全体同学讲话：“我们今天请愿不成，看清了统治者的面目。一定要用更大的行动来回答他们！”

就在清华、燕大的队伍找机会进城的时候，城内的学生已经按原定计划

进行了。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女一中的学生。上午 10 点多，一二千学生已汇集到新华门前。同学们临时推出中大学生会主席董毓华、东大学生宋黎和师大学生陈泽云等 12 人为代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请愿。到了中午，何的秘书才出来说，何眼下不在北平，学生的要求可代为转达，并说华北成立政治组织是国家的政策，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等。同学们呼喊“打倒卖国贼”的口号表示抗议，这位秘书只好缩回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各校代表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总指挥为东大的宋黎，路线定为先去西直门，接清华队伍入城，然后到天安门举行大会。示威队伍由中大学生带头，冲过了西单牌楼军警的第一道封锁线和西四牌楼的第二道封锁线，向前进发。这时，交通员探知，西直门附近已布满了军警，并架起了机关枪，要以武力打散学生。于是，代表们决定改道东行，奔向沙滩、王府井。途中，辅仁大学刘达等 100 多名同学加入了队伍，到了红楼，又有敲钟临时会集起来的 200 多名北大学生参加。队伍越来越扩大，到王府井大街时，已超过 3000 人。

当队伍抵达王府井时，一场惨烈的搏斗开始了。军警用水龙头、大刀、木棍等喷射和砍打学生。东大的林泽被打断了鼻梁骨，女二中的毛真左臂被砍伤。经过长达二三十分钟的流血搏斗，赤手空拳的学生队伍还是被冲散了。指挥部当即通知学生到北大三院集合。在这里，宋黎传达了学联的意见：从 10 日起，全市实行总罢课，再准备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之后，队伍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各自返校。

12 月 10 日，北平的学生举行罢课，在罢课中，学生们首先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并展开了救亡活动。当时，燕京大学的学生救亡工作很活跃。清华学生会经常和燕大的学生会（主席张兆麟）组织多种形式的专题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有：“华北如有变动青年应该怎么办？”、“日本侵略华北的方式”、“《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之真相”等。

学生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吓坏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北平当局。宋认为学生游行罢课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即是反对他的，因此竭力压制，将警车队和保安队开进了城内外的各重要学校，随时准备逮捕爱国学生。冀察当局还将各大学校长召集在一起，商讨制止学生运动的办法，并在 13 日发表了《告学生书》。此后，各学校当局举行师生谈话会，劝导学生安心上课，但结果却不如他们所想。当时，清华的校长梅贻琦在全体学生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说：“你们一去游行，清华就保不住了。你们应当爱学校。”当时就有一位学生站起来反驳说：“校长，我们爱学校，可是更爱国家。”同学们为这位学生热烈鼓掌，搞得校长很狼狈。

在此期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声援。在有利的形势下，北平市学联在中共市临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地研究和制定了举行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方案和战斗部署。在 12 月 14 日北平报纸刊登出国民政府要在 16 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学联立即决定在 16 日再发动一次大示威游行。这次游行由宋黎和邹鲁风公开负责指挥，另派代表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扩大影响，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响应。这次示威队伍共分四个大队，第一大队由东大率领，第二大队由中大率领，第三大队由北大率领，城外各校组成第四大队，由清华率领，参加学生共约 1 万人。

为了给游行作准备，清华成立了临时纠察队、交通队，赶作各种宣传品，

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学联鉴于清华和燕京上次游行在城外受阻的情况，决定每个学校抽出 30 人组成先遣队提前进城。先遣队员临行前，与同学们饮酒告别，以表达为了民族的解放甘愿牺牲的决心。

城外的清华和燕大等校学生在 8 点汇集到西直门，但城门紧闭，戒备森严。队伍转而至阜成门，又到西便门的铁路门，途中，平大农学院、孔德中学的学生加入队伍。面对这个铁路门，同学们怒火中烧，大家臂膀挽着臂膀，在“一、二、三”的喊声中，用集体队伍的力量，猛力撞开了紧闭的铁门。铁门一撞开，刹时鸦雀无声，接着就爆发春雷般的欢呼声。他们终于进城了。队伍到了和平门，冲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并接应了被包围在这里的师大同学，然后一起在珠市口与大队伍汇合。

关于城内的情况，以北京大学为首的第三大队冲破军警对学校的包围圈，和附近的学校汇合成 1000 多人的队伍，到南长街时，遭到了军警的水龙头的喷射。一部分同学绕到军警背后将水龙头割断，李俊明、朱穆之、杨雨民等，冲上去夺过水龙头，反向军警喷射。这样，大队人马冲了过去，在新华门又冲破了第二道防线。虽有同学受伤，队伍还是向天桥开进。以东北大学为首的第一大队和清华、燕大的先遣队伍 200 多人一起，从北河沿出发，沿途联络了一些院校的同学，到石驸马大街师大文学院前接应师大同学突破军警阻拦时，军警用马鞭、大刀向同学们乱抽乱砍，队伍经过多次顽强抵抗，才赶往大会会场。以中国大学为首的第二大队的同学们采取“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方式，赶往天桥。

11 时左右，学生和市民召开了市民大会，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大会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决议。

当清华和燕大的队伍与大队伍汇合后，这时队伍人数已有 2 万多人，浩浩荡荡向前门开进。到了前门，军警阻拦，无法进城，便在前门外广场召开第二次市民大会。大会由师大的阎世臣担任主席，通过决议，向北平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要求对日宣战和保证不再逮捕屠杀学生。但是，会后，同学们又遭到军警的阻拦和毒打，只好分散回校。这天共有二三十人被捕，400 多人受伤。

“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虽然遭受了残酷的打击，但北平学生冲破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响亮地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掀起了全国救亡运动的怒潮，配合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伟大运动。“一二·九”运动是划时代的伟大革命事件。从此，中国革命的形势，经过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除农村中工农武装革命而外），重新进入新的革命时期。

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

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在全国传开后，立即得到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广泛响应，并进而引发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洪流。

与北平距离很近的天津，在得到消息后，法商学院的学生党员朱纪章、郝金贵等，立即去和他们平日一起做抗日宣传工作的杨秀峰、温公健商量，组织法商的进步学生到南开、北洋去串联，决定由法商牵头，18 日举行游行示威。

这天上午9时，各校爱国学生行动起来了。他们组成了两支大军，一支由海河南边的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等校组成；一支是海河北边的法商学院、北洋公学院、天津师范学院、扶轮中学、河北工业学院、震中中学等校组成。他们先到市政府请愿，遭到拒绝后，立即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冲破军警阻拦，沿途高呼抗日口号，散发传单，并向市民做宣传演讲。下午1时左右，队伍齐集在南开中学操场，举行全市学生大会，讨论通过了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派代表慰问北平学生、要求集会结社言论自由、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提案，并决定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宣布从19日起全市各校总罢课。会后继续示威游行。下午5时左右，示威才告结束。

“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各校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迅猛发展，遭到了天津当局的镇压。24日，大批武装保安队包围了法商学院，同学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扩大抗日救国力量，他们决定与北平学联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朱纪章等人 与北平学联取得了联系。双方经过多次商讨和酝酿，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平津学生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平津及华北地区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具有悠久革命斗争历史的上海是在17日得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的。在北平学联举行“一二·一六”运动的同时，即派陈翰伯、韦毓梅、陈元等三人到上海通报情况。三人打电话找到了《大众生活》的主编邹韬奋。邹随后又介绍他们与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等人见面，还领他们到各校去报告，发动群众。

12月17日，上海51所中学的代表100多人集会，成立了上海中学联。会上，韦毓梅介绍了“一二·九”运动的情况；18日，80多所中学的学生发表联合宣言，反对华北自治。这时，已于12月12日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筹备中的妇女救国会、职业救国会联合行动，促使被国民党政府压制的上海大学生冲破阻拦，声援北平。

上海离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很近，国民党对上海的大学生实行严密控制，封锁北平的消息，对学生运动采取：“消弭”、“戒备”等手段。即使如此，17日，复旦的几百人仍向上海市府发动了请愿行动。上海当局见学生运动已经无法“消弭”，便让安插在学生中的“御用”者，采取“转变方策”的手段，主动提出在19日晚就去游行，妄图使运动按照他们的设想草草收场。面对着这一情况，进步学生商量，如果自己不参加，就会脱离群众，还是应该参加进去做斗争，于是也都去了。虽然“御用”学生事先通知禁止喊口号，禁止唱歌，但群众的爱国热情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到下午7时，上海各大学、中学的学生汇合在一起。队伍路过汪精卫、曾仲鸣住宅时，学生们愤怒地喊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第二天凌晨3时，队伍到复旦汇合，复旦的党员和社联盟员和群众一起加入队伍，从这里出发去市政府请愿。上海当局下令熄灭路灯，并抓去了交大学生李振声等人。游行队伍摸黑在6时才到市政府。在学生们的呼喊声中，市长吴铁城只好与学生对话。同学们把写有“要求制止华北当局压迫学生爱国行动”、“维持领土主权之完整，出兵收复失地”的意见书交到他的手里，并逼迫他答应释放被捕的学生。之后，上海的各中学也发动了游行示威。

在这大好的形势下，上海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同盟和中央文委决定，在上海各界救国会筹备初步就绪的基础上，于12月24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有文化、教育、职业、妇女等各界人士和广大学生、工人群众参加的游行示

威，由文总党团负责人王翰担任总指挥。

24日天刚亮，各学校的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即在南京路组成了4人一列的游行队伍，开始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在与英国巡捕进行了搏斗后，沿浙江北路向东方图书馆进发，在东方图书馆广场上，举行了上海市民大会。这次游行以后，建立了经常性的上海各界救国指挥部。

在这次游行的前一天，复旦大学的学生在校体育馆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组成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讨逆”。当同学们到了车站，登上列车后，即被军警层层包围。当天夜里，请愿学生发表了《告同胞书》，向广大群众表明时局的严峻：“国家处此危迫之秋，和平早已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舍抵抗不足以救亡，唯斗争方可言立国。”并表示，“此次行动，纯为爱国情绪所驱，将以严肃之精神，整齐之步伐，抱最大牺牲之决心，努力到底，冀达救亡图存之心愿。”

24日早晨，上海各界及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听到消息后赶来慰问，何香凝也来到车站。她质问前来“劝说”学生的教育局长潘公展说：“学生们要抗日，是爱国的！要说坏人，坏人说是你！”这时，很多前来慰问的学生也加入了请愿队伍，人数已有3000多。

火车停开震动了上海市。下午，吴铁城迫于压力，答应开车送学生们去南京，暗中却在青阳港预先埋伏下大批军警，企图拦截。学生们发现了这个阴谋后，再三动员司机闯了过去。车到昆山，特务又用“枪毙”吓跑了司机。复旦和交大的三个同学便自己开着火车，慢慢行进。不料，特务们又采取了拆毁路轨等破坏手段，学生便自己修路。这样走走停停，直至27日车才到了无锡。特务又把前面的路轨拆毁了。学生派代表进行交涉，却被抓了起来，并且派来了一辆火车头，要把列车拖回上海。学生们纷纷下车与他们交涉，有的以卧轨表示决心。最后，火车被拖回了无锡。江苏教育学院的教育长俞庆棠到列车上来慰问；上海各界救国会的人也赶来慰问。学生们见前进无望，便在无锡城示威游行。后来，潘公展又从上海赶来“劝说”学生回上海，甚至给学生们跪下。学生就把他扣住。潘没有办法，便提出双方交换“人质”，让他出去，让被扣押的学生代表回来。最后，国民党的军警宪兵将学生押送上火车。无锡的爱国学生冲破军警阻拦，到车站为上海学生送行。车上车下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上海学生走后，无锡各校学生即在公园举行了全体学生大会，宣布成立无锡学生救国联合会，统一领导无锡学生的救亡运动。

25日，蒋介石通令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戒严，禁止游行罢课，否则以犯法论处。学生们回到上海后，发表了答吴铁城的《告学生书》宣言，坚决表示：“倘政府不采取确实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保障中国领土完整的步骤，我们绝对不放弃我们的罢课、游行等武器。”

上海学生的爱国行动震惊了全国，争取到了社会上较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对冲破上海长期被压抑禁锢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并造成了广泛的爱国群众运动。此后，上海救亡运动蓬勃高涨。随着全国学联、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的成立，形成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巨大力量。

在天津、上海爆发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同时，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学生及海外侨胞，都饱含满腔的热情，以各种方式进行声援，在全国形成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巨大革命洪流。

五、“平津南下宣传团”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示威之后，各大中学学生一致罢课，而各学校当局则在国民政府的指令下，纷纷提前放假，企图分散学生的力量。学生运动往何处去，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袭击派出所、夺取武器与敌人斗；有的主张下乡发动群众；还有的主张再像“九·一八”那样，到南京请愿去。

当时，中共北平工委决定利用这一段时间，组织一个规模较大的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到农村去扩大抗日宣传。这样，既可将新涌现的积极分子团结在一起，又可将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农民中间去。

但是，党的这一正确决定当时却不为大多数同学所理解。

那时的情况是，国民政府为了分化、瓦解学生运动，以学生到处请愿为由头，让学生选出代表赴南京。一些学生看不出这是蒋介石企图收买学生，反而认为“九·一八”那次大批学生云集南京，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次还可利用赴京的机会，扩大政治影响。

在各大大学都奉命选派“赴京聆训”代表的情况下，北平学联决定召开由各学校代表组成的会议，商讨究竟是南下宣传还是赴京请愿的问题。

在会议过程中，赴南京请愿的意见仍然占多数，大会执行主席郭明秋决定休会。经过充分的酝酿，学联党团成员彭涛、黄敬、孙敬文等作了很多解释工作，复会后北大代表刘江凌又作了长篇有说服力的发言，终于通过了组织南下宣传团的决议。同学们按照这一决定，积极进行准备。一方面宣讲南下宣传的意义，另一方面准备宣传品，学唱救亡歌曲，购买下乡用的蓝布工裤和球鞋。

宣传团按军事化的方式行动，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宣传团设立了总指挥部，由董毓华担任总指挥，姜文彬（江明）、宋黎任副总指挥，彭涛任党团书记。总指挥部及所属团队，各设宣传、组织、交通、事务、纠察、救护和调查等专职人员。

宣传团分四个团，一团由北大等东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由北大当团长；二团由东大、师大、中大、法商学院等西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团长由法商学院担任；三团由清华、燕大、辅仁大学等西郊和北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团部领导是黄华、吴承明等；四团是由天津的大中学校组成。各校参加南下宣传的，大多数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共计500人左右。

1936年1月3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南下宣传团的团员们，只穿一身棉衣裤，带一床薄军毯出发了。临行前，有的大队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有的进步教授还特意来送别。清华的张申府教授的夫人刘清扬，清晨赶到清华体育馆前，与即将出发的女学生握手话别。

宣传团南下后，沿途在大的居民点和集镇进行宣传、访问，召开群众大会和帮助乡村学校组织救亡团体，在广大群众中播撒抗日的种子。当时用的主要方式是唱歌和演节目。唱的歌有《时事打牙牌》小调和苏联的《工人歌》等。《时事打牙牌》是从东北义勇军传来的。歌词是“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那一天，关东起狼烟，哎咳哎咳，关东起狼烟”。《工人歌》的歌词是：“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熏黑我们的脸，火火烧焦了我们的心窝。”

南下宣传的四个团在7日、8日分别到达固安集中，但县长不让学生进

城，宣传团就在城外开展宣传工作。9日，全体团员在一个大车店的院子里开会，讨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宣传的口号中，到底是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呢，还是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由于中国历来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有些人是认识不清的，争论非常热烈。最后，由北平学联的董毓华根据党的“八一宣言”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阐明了为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口号是正确的道理，统一了思想。

南下宣传团的活动，对同学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时的宣传团骨干分子、后来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的李昌，在60年后谈到这次行动的感受时说：“南下宣传中和农民群众的亲身接触，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劳动人民的痛苦，也深刻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强烈的抗日和革命的要求。这样，我们就从原来的只是激于爱国热情、单纯要求抗日的立场，提高到初步具有为工农大众谋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如果说，昨天在游行中因为冲破10年白色恐怖，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而感奋得热泪盈眶，那么，今天在华北原野上毫不顾虑地高唱《时事打牙牌》和《工人歌》，我们是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战士而自命和自豪了。”黄秋耘同志在《风雨年华》一文中写道：“十多天南下扩大宣传，……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倒是非常深刻的。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宣传品和书籍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主要还是通过现实生活的教训，……现实生活毕竟是最有说服力的，最能打动人心的”；“当时我下决心要参加革命。”

从这些老同志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的大批宣传团员，都走过这样一个成长的道路：爱国学生——宣传团员——民先队员——共产主义战士。

南下宣传团的抗日救国活动，震动了北平当局，在他们指令一些学校派人去劝说学生回校，并下令沿途各县镇压、破坏无效后，便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宣传团围追堵截，武装强迫他们返平。

15日，第二团在新城县的辛立庄，遭到特务和保安队的堵截，除一部分团员突围出去寻找第一团外，其余的人都被特务绑架到卡车上，押送回到北平。

当二团被包围时，指挥部的董毓华、宋黎连夜回北平汇报情况。中共北平市委考虑，再坚持下去有困难，决定宣传团不再往南走，并派人通知宣传团，一、二团指挥部遂决定，到保定后立即回北平，停止南下。

第三团在14日到达高碑店后，就被军警围困在一所小学校里。当时，团员们明白再向南走是不可能了。领导小组的几个成员用英语讨论回去以后怎么办，并向团员们传达了讨论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回去以后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

晚上8点，团员们自动排好队伍，4个人一排，大家相互挽着手，向火车站走去。到了车站，才知道当晚已没有北去的火车了。住进了小客店后，军警特务怕队伍继续南下，将几间小客店包围了，先将冷水泼进屋里，后又把窗户点燃了。团员们拿起桌子腿和板凳做武器，拼死抵抗。第二天一早，才在军警的押送下，上了火车。

16日，回到北平的第三团在燕京大学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基本成员是参加过高碑店斗争的宣传团员。

21日，到达保定的一、二团，在得知三团被押送回平并成立团体的消息后，也决定成立永久性的组织，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二天，也被押送回到北平。

2月1日，一、二、三团在北平师大召开了团员代表大会，决定两个组织统一，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制定了工作纲要和有关组织问题的文件，并且发表了成立宣言。民先总队部第一任负责人是敖白枫（高锦明）、刘道生、王仁忱等。

民先队的成立，标志着“一二·九”运动有了坚强的先进青年的骨干组织，运动也将巩固地发展下去。

六、反对搜捕斗争和“三·三一”抬棺大游行

面对蓬勃发展的全国各界救亡运动，国民政府在1936年2月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规定解散救亡团体，可以逮捕甚至枪杀爱国分子。接着便在全国开始了镇压行动，企图把刚兴起的革命热潮迅速打下去。

从2月25日起到29日，北平当局连续搜查了中大、北大三院和清华等许多学校，共逮捕同学100多人。同学们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学联党团的领导下，开展群众性的反逮捕斗争，其中以清华最为出色。

军警是在29日的黎明开进清华园的。大概有400多人，将学生宿舍包围了，然后按黑名单抓人。当时清华民先队长李昌回忆说：“我们一些民先队员带头，和同学们一道冲破了包围圈。这时，我们听到消息说，军警已在二院宿舍开始抓人了。我和民先队员立刻向校门口警卫室跑去，把绑着的蒋南翔和纠察大队长方左英抢救出来，从城内坐校车刚回学校的姚依林也被拘留在那里，也放开了。愤怒之下，我们还把军警的汽车给烧毁了。军警撤走后，清华的主要干部都分散隐蔽，以防他们再来搜捕。”

果然，当天晚上，北平当局又出动了包括二十九军在内的约5000名军警，对清华进行搜捕。由于学生救国会和民先队员早有准备，把大多数同学集中和隐蔽在体育馆的后厅里，军警一直到天亮才冲进了体育馆。他们胡乱地抓了二十几个人，主要干部一个也没抓着，便气势汹汹地撤退了。

在反逮捕斗争中，由于清华的进步学生紧紧地和全体师生站在一起，所以不仅清华救国会事后发出快邮代电陈述真相，连校长梅贻琦也打电报给南京政府替学生申诉：“本校方将举行学期考试，拒于晨6时军警500余人来校检查，逮捕学生，多数学生群起抗议，全校惊慌不安。”要求政府采取缓和处置，不要再来镇压。

在对北平爱国学生进行镇压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对上海、济南、武汉、太原等一些城市的学生进行逮捕。

面对军警的镇压，爱国学生的心态如何呢？李昌同志回忆当时清华的情况时说：“这两次的搜捕，加深了我们对军警的仇恨，也更激发了骨干分子的斗志。但是，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反搜捕斗争后，一部分学生领导，迫于家庭压力，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另外，大批学生领导骨干的离校，国民党的御用教授趁机大肆鼓吹‘读书救国论’和安逸的学院生活等，对一部分同学，甚至个别民先队员，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面临着困难的情况下，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在1936年的3月，指示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部分散转移：蒋南翔到上海，郭明秋、姚依林、孙敬文赴天津、沧州。北平学联的党团工作由陈瀚伯负责。

抗日救亡运动虽处于极端困难和白色恐怖之下，但是同学们的爱国热情

却不是镇压所能吓倒的。为了冲散笼罩在北平的沉闷的氛围，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反抗的呐喊，一部分激进的同学发动“三·三一”抬棺大游行。

当时，北平十七中学 18 岁的郭清同学，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消息传来，大家怒火中烧。北平学联反映了一部分激进同学的情绪，决定在 3 月 31 日在举行追悼郭清大会并准备游行示威。

事前，学联负责人征求了中共北平市委的意见。市委领导同志对于敌人正在寻衅向爱国学生发动进攻的严重形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便同意了这次行动。

这次大会是在北大三院召开的，参加的只是民先队和一些积极分子 1000 多人。会场内点燃着蜡烛，四周摆放着各校送来的花圈和挽联；平津学联送来写有“郭清今日不死，为民族奋斗，虽死犹生”的白色横幅；一位东北籍学生买来一口柏木棺材，放在礼堂中央，棺上挂有郭清的速写像。会场气氛庄严肃穆。

北平公安局内六区得知后，立即派警察包围北大，锁住了校门，并企图让校长蒋梦麟出面制止，但同学们拒绝了蒋梦麟的要求。大家推举清华、北大、师大三校组成主席团。在北大救国会主席韩天石致词后宣读祭文，然后，有天津学联、民先总队和北平妇女救国会的代表发言。大会决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和不再出现逮捕学生的现象，要求停止内战，实行对日抗战。这时，北大开除韩天石、吴沛苍、巫省三、叶纪霖的布告，也贴到开追悼会现场的礼堂门口。于是，大家更加愤怒，就从邻校孔德中学后墙，由姜文彬用粗树干将小门撞开，大家迅速拆开一个缺口，从北池子向南抬着空棺游行。杨学诚、柯家龙（燕京学生）和李昌打头阵。到了北池子南口不远，就遭到军警的突然袭击，抓去了 53 名学生，其中女生 17 人，还有一名记者。

“三·三一”游行受挫，损失是相当大的。在 2 月大逮捕中，敌人靠黑名单都抓不到的学联和民先队的负责人，却在这次被抓了。如学联的黄华、北大学生会负责人谢云晖、清华党支部负责人赵德尊等都在内。但是，血的教训也使同学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革命只凭热情是不成的，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必须从政治上、从当前的形势上周密地考虑问题。

七、刘少奇同志主持华北局工作， 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在民先队的组织和进步学生的力量受到损失、抗日救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主持工作。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反蒋抗日转到逼蒋抗日（后来又转到联蒋抗日）的策略口号，以及在工作中肃清“左”倾关门主义残余等方针、政策、方法和作风的指示，都反复传达过，并且组织讨论。这对于端正爱国学生的统一战线思想和进一步广泛开展救亡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北平市委首先对学生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加强了形势教育、统一战线教育和做好群众工作的教育。学联及各校学生会、救国会把工作的重点落在了“广泛团结广大师生，加强师生合作”上。4 月，平津学联改组为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与之相适应，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并在 25 日就改名发表了第一次宣言。宣言指出：我们的目标一直是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现在改名就更切合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争取中华民族解

放”的宗旨；改名之后，学生运动要有新的路线和新的姿态，要广泛团结学生和教师，争取各界的指导与合作。

5月17日，诞生在华北国防前线的民先队，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了代表大会，与会的30多位代表认真学习和讨论了联合阵线的问题，确定了工作策略和方针：把争取广大学生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心任务。此后，民先队在市委和学联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同学，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方式，如组织读书会，歌咏队，办清寒食堂，扩大民众学校等，而最主要的是抓紧了游击战术训练和政治学习。

最初的游击战术训练，是秘密进行的。有一次，党组织找到一位打游击有经验的同志，由黄华借到燕京大学一位教授的客厅，开了一天的训练班。4月28日，就由清华、燕京两个大队开始在西山举行行军和游击战演习，方式生动活泼，效果很好。这样，民先队总部也采纳了这一作法，成立了专管军事训练的武装部，由杨雨民负责。秋后，中共北平市委又特地介绍了老红军袁也烈和军事干部朱则民当军事教官。军事演习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钓鱼台和西山是经常演习的地方。最初几次，军警还出动干涉，但是我们的队伍采取化整为零、分进合击的方式，军警根本控制不住；后来，他们也就习以为常，不大管了。

游击战术训练，不仅对当时组织游行示威很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大批民先队员抗战后参加了敌后游击战争。

组织政治学习，也是学联和民先队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斗争的开展，遇到的问题日益增多和日益复杂，队员们对革命理论的学习和各种问题的讨论，兴趣也愈浓厚。为此，民先队总部推荐了一批书目供大家阅读。这些书目有《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中国大革命史》、《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萍踪奇语》、《母亲》、《铁流》、《毁灭》等。当然，那时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党内负责同志所写的文章是不合法的，只能内部传阅，不能公开。学习的方法是，个人阅读、集体讨论。

为了帮助广大学生提高对当前政治形势和抗日救国运动的认识，北平学联把不定期刊物《学联情报》改版为《学联日报》，民先总队部也办有不定期的机关报。各校学生也运用自己办的刊物进行宣传教育，如清华的《清华周刊》、燕大的《燕大周刊》、师大的《师大学生》、北大的《北大旬刊》、东北大学的《东大周刊》、平大工学院的《救亡》等，成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的重要阵地。

抗日救亡文艺活动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发展。当时救亡歌曲和街头剧的教育作用很大，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荣千祥（高棠）的国难大戏，崔巍、张瑞芳演出的街头名剧《放下你的鞭子》，东北大学演出的话剧《流亡曲》等，不但深深教育和感动了广大观众，也使参加这些活动的同学的政治觉悟得到了提高。

在北平抗日救亡运动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同时，全国其它城市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走出低谷。在上海，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和文化界救国运动紧密结合，使运动向纵深处发展，并在5月底成立了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在天津，党也把学生运动与全社会的救亡运动结合起来，使抗日运动向工厂、农村发展。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复兴，为全国青年学生成立统一领

导的救亡组织提供了时机。

八、全国学联的成立

早在“一二·九”运动兴起以后，全国各地学生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的同时，平津学联就决定发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随后，北平学联派北大的刘江陵和中大的董毓华前往上海筹建。在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王翰、胡乔木的指导和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支持下，筹建工作很快展开。参加筹建工作的除北平和上海外，还有天津、杭州两市的学联。

经过广泛的宣传和周密的组织，1936年5月29日，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杭州、武汉等全国各地的学联代表共28人，齐集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会议室，正式召开了全国学联成立大会。

大会决定将全国学联定名为“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并按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指导思想，通过了纲领、章程和宣言，提出了全国学联的各项抗日救国的主张，强调全国学联“将在全国学生热烈的拥护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到底！”

全国学联的成立，对大力宣传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使全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而且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青年学生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学生界的关注和支持。1936年2月8日，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在致中国同学的信中说：“眼看着你们为中国独立而奋斗，为民族文化自由发展而斗争，我们以‘世界学联’的名义，十二万分感谢你们这种伟大的努力。在学生运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次运动能比得上这次更有毅力和勇气，没有一次运动能比得上这次更统一，没有一次的领导联系得像这样好。我们看到你们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上，能如此自觉，我们也就十二万分的光荣。”

1936年2月29日到3月1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青年保卫和平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要唤起全世界学生要求国联对日制裁；同时也一致通过决定，反对压迫中国青年，尤其是为自由和和平而斗争的学生。3月14日，由世界学联等团体发起的国际学生会议在伦敦举行。在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宣言中，对中国学生“为保卫中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英勇斗争特别表示敬意”；会议“确认援助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是和平与民族独立斗争中最主要最重大的一面。”为此，会议号召“全世界同学援助中国同学，要求中国政府给予中国同学言论、出版、集会绝对自由，释放被捕同学”等。世界学联在给北平学联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规定，自4月22日到29日为世界和平运动周，号召全世界学生在这一周内举行总罢课，向各地日本使馆、领事馆示威，向国联提抗议，向中国政府提出允许人民有救国自由等几点要求。”信中通知北平学联，8月底将在日内瓦举行世界青年大会，希望中国派代表出席。

4月24日，北平学联发表《为响应世界学联援助中国反日运动宣言》，宣告“中国民众诚恳地接受了你们同情的援助，中国民众和你们永久地联合在一起，推进反法西斯运动，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面对世界学联对中国学生运动的同情与支持，全国学联成立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中国学生运动与世界学生运动的联系。1936年8月31日至9月6日，在日内瓦世界青年大会上，全国学联宣传部长陆瑾等参加了会议。陆瑾在大会上代表中国学生所做的报告中，在介绍了中国学生为民族解放所做的努力之后强调说：“在今日的中国，关于青年的一切，都集中在一个基本的问题——抗日救国上面。”呼吁世界学联对中国予以最大的支持。

9月20日，陆瑾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向侨胞们介绍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和全国各地学生救国运动兴起的情况，她希望“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友人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携起手来，共同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全国学联的成立，使中国的学生运动汇入世界学生反法西斯运动的洪流，而世界学生的支持，又给予中国学生以极大的鼓舞。

与此同时，鉴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大影响，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8月5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北方局，鉴于“北平学联的活动，不仅在河北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意义，而且影响全国学生”，中央要求，“省委应当特别注意其领导，特别注意吸收学联中能干的、最先进、最积极、最忠实的同志，参加省市两级工作。以便更正确地领导学联。”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10月成立了“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负责领导各校学生党支部和学联党团，蒋南翔为书记，委员先是高承志、于启明，其后为王德、张敬斋和杨学诚。学委直接由北方局和北平市委彭真、安子文领导。从此，学生运动在党内有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和专门研究情况、决定对策的组织，而学委的领导则由民先队为骨干来贯彻执行。

为了更好地发挥民先队的骨干先锋作用，8月，民先队各级干部实行民主改选，李昌为总队长，市委的黄敬直接负责领导。此后，民先队由北平向全国及国外一些城市发展组织。在西安事变后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民先队总部直接和北方局的彭真联系。在彭真的领导下，1937年的2月6日，民先队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队员有6000人，到会代表24人，代表18个地方队部。鉴于大规模的武装抗战已迫在眉睫，这次大会提出了民先队的基本任务，那就是，在大力发展民先队员的同时，加强学习军事，用各种方式建立民众的武装力量，把救亡运动发展到广泛的各阶层中去，特别是工农大众中去。大会还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和告队员书。李昌任总队长，与李哲人、刘导生共同组成全国总队部。民先队全国总队部的成立，进一步从组织上巩固了全国学生运动的成果。

九、体现统一战线思想的“六·一三”、 “一二·一二”大游行

“一二·九”运动所掀起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运动，以及共产党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的正确指导思想，使全民族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全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也进入了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新阶段。

1936年春夏，日本政府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定了“华北防共协定”，日本侵略军在“防共”、“保侨”的名义下，向华北大举增兵，并在天津设立控制华北和进攻全中国的最高指挥机关“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与此同时，

日本在经济上大搞武装走私，破坏中国海关行政。尤其令人愤怒的是，日军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残无人道地杀害了被迫为他们修建军事工程的数百名中国工人，将尸体抛入海河。华北濒于危亡的局势再一次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愤慨。

中央北方局在研究了形势后，决定发动平津学生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中共天津示威的林枫、易吉光、彭涛、李启华等进行了研究部署，确定游行的时间在5月底前后；游行队伍不进入日租界，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游行时的口号要体现我党的政策，以扩大党的影响。

5月28日，天津学生高举“反对日军增兵华北”的大旗，高呼“抵制日货，制止走私”、“清查海河浮尸”、“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等口号，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大示威。当队伍遭到保安队和警察阻拦时，学生们把专为军警印刷的传单散发给他们，有的学生则对军警讲道理，反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反而伤害自己的同胞兄弟？由于作了这些宣传，双方没有发生冲突。游行学生举行了近万人的群众大会，通过了发动全国工人总罢工、商人总罢市等议案。

由于这次游行是在华北日军的大本营举行的，因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不但显示了华北青年学生反抗日寇统治的决心，而且直接打击了日军吞并华北的野心，并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6月13日，北平学生为响应天津学生“五·二八”游行示威，发动了游行示威运动。这次运动对激发二十九军的爱国热情，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这次斗争中，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北平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清查海河浮尸”的口号，造成了平津救亡运动广泛开展的新局面。沿街的二十九军也为学生的抗日热情所感动，所以，他们虽然沿途阻拦，但已不像以往那样毒打学生了。同时，民先队员们所学到的军事知识也发挥了作用，在游行中采用了一种灵活的迂回前进的“穿插战术”，叫做“头调尾，尾调头”。当先头部队遇到顽强障碍时，立即改变方向，后卫带头从旁绕道前进；再遇到阻拦时，新的先头部队又变成后卫。这样灵活的渗透，使军警根本无法阻拦。

“六·一三”游行后，利用这一大好局面，民先队和爱国学生把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到了国民党部队。学生们利用一切机会和二十九军接近、联欢，表扬他们在喜峰口抗日的爱国行动；日军于11月3日在北平城郊举行军事演习之后，市委发动社会上层和二十九军内部，影响和推动二十九军进行了两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学联组织学生热烈慰问，并且向官兵献旗，使二十九军受到很大的鼓舞。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的大好局面下，北平学生又发动了进一步体现统战思想、团结国民党军政的“一二·一二”大游行。

1936年12月12日的北平学生大游行，原本是准备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12月9日举行的，游行指挥部由市委黄敬、学委高承志和民先队总队长李昌组成，李昌任现场总指挥。但12月9日这天，正赶上段祺瑞的大出殡，城内戒严。为了避免与军警发生冲突，李昌建议指挥部将游行时间定在了12月12日。

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在日本加紧进攻的形势下，站在国防前线的北平广大爱国学生推动时局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发展。因此，这次提出的口号是：“援助绥远抗战”、“争取爱国自由，释放救国领袖”、“各党各派

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等。

这次游行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充分运用了游击战术。清华、燕京头天都派了先遣队员进城以接应大队，各校学生为避免一出校门就和军警打“遭遇战”，也不在学校集合，而在好几个地方分别集合，最后汇合在东皇城根。

游行的队伍在东华门遇到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们围着汽车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将军领导抗日！”的口号，要求宋哲元接见。下午1时，游行队伍在北大一院操场集合，传来保安队通知，宋哲元要在景山对学生训话。李昌回忆说：“那时我们还拿不准宋的态度是否真诚，也担心宋是否会借此机会镇压，但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救亡运动的合法性，下午2时左右，我还是指挥队伍开到了景山。当时，冀察政务会办事的人很是粗野，队伍进入景山公园，他们就把大门紧紧关上了。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很担心他们要对学生实行镇压。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怕当官的没来，学生一走，他们交不了差。事后我又了解到，在外面负责指挥的黄敬，也以为可能发生屠杀学生的惨案。为防止万一，他在外边动员了有关的上层人士，又通知中外记者到景山采访。北平市委的李雪峰、安子文也到景山附近观察事态的发展。”

后来，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向同学们讲了话，除了为国民党不抵抗政策辩护几句外，一再表示他们也是抗日的，希望同学们谅解。这样，这次集会游行完全取得了合法地位，当天在城内整队游行，高呼口号，再也没有军警阻拦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

十、西安事变后全国救亡运动的新形势

在北平学生酝酿“一二·一二”大游行的同时，西安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决定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这次运动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12月9日清晨，西安举行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阻拦。当一名小学生被特务打伤后，游行队伍群情激奋，决定到临潼华清池向前来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得知后，令张学良对学生进行镇压，“格杀勿论”。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张学良亲自驾车追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们回去。站在队伍前列的东北大学的学生表达“我们愿为祖国而死！”的心情，同学们在痛苦声中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誓雪国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也激动地哭了。他向学生们许诺：“我并不是愿意当亡国奴的人。在一个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如果我失信，请你们把我处死！”

3天以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事变立即引起国民党内部和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借讨伐张、杨之机，以亲日派首脑汪精卫取蒋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力主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确立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在学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就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演变的前途及学生的希望和任务举行了3次座谈会，并于19日发表了《为陕变泣告全体同学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和平解决，反对任何借口的内战；各

党各派联合起来，立即对日作战；召开全国救亡代表大会，实行民主政治；要求蒋张合作抗日等4项要求，并向同学们呼吁：“我们认为非全国和平团结，无以挽救危亡；同时我们又认为非全体同学和平团结，更无以作全国先导。”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时局如此迅速曲折的变化，在北平学生界引起一些波动。北平的国民党特务，则利用这一机会，在12月25日对救亡运动发起猛烈的政治攻势。他们将人民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危机消除而称庆的心理，狡猾地转换成庆祝张、杨悔过、领袖脱险的活动。他们发动市民鸣放鞭炮，并集合部分右派学生举行火炬游行。次日，又令各中学放假游行，并操纵成立了所谓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为避免鱼目混珠，人们称之为新学联，实为伪学联）。伪学联依靠政权的势力，准备以暴力打垮各校学生会和民先队。25日晚，清华“护校团”擅自搜查民先队员宿舍和救国会，把搜到的《清华周刊》和一些救亡书籍，在操场上付之一炬。师大的“饭团”（以投靠国民党来拿津贴谋出路的少数学生）殴打师大民先大队负责人阎世臣等。但是，由于各校民先队的有组织的行动，这股不可一世的气焰很快被阻止了。

但是，要打退国民党的政治进攻，还要把广大同学团结到学联和民先队周围，孤立反动势力。学委经过充分地酝酿，提出了“生活路线”，作一些以抗日为内容的群众文化福利工作，以团结绝大多数同学。最突出的是春季野游。学联和民先队在1937年的春假中，组织同学到西山一带旅行，采取演出等生动活泼的方式，宣传抗战。第一次是去香山。游山后，崔嵬和张瑞芳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第二次去温泉，参加的人更多。这次在现场排演了一幕《公审七君子》的活报剧，生动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压迫救亡运动的反动政策。演出结束后，群情激动，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这样的活动，博得了广大同学的拥护，团结同学的目的达到了。

西安事变后，在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下，文化界一些人不能理解在民族矛盾发展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党的策略的转变，在舆论界大肆宣传取消左派、取消特区的“片面抗战”的谬论，出现了一股右倾投降的逆流。

1936年12月底到1937年5月，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6篇《寄北方青年》的文章，文章在“我们目前的路线是‘团结建国’，其方式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前提下，对广大青年极其关心的抗日问题进行了错误的阐述：“‘抗日’这两个字，它的本身的意义是消极的，而且是有限制的，不能成为一种国策，更不能成为一种主义。”企图把北方青年从斗争前线拉回到后方。

《大公报》的文章，迎合了徐芸书、黄刊等有右倾思想的青年的心理，引起了他们的呼应。

徐芸书、黄刊曾是清华“一二·九”运动的早期骨干，但在1936年秋，由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曾发表了一系列以“无条件统一”为题的文章，宣传取消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们甚至在学生运动的实际工作中，也主张取消党所领导的民先队和学联。当《大公报》的文章一出笼，他们再次与之一唱一和。

徐芸书、黄刊在《国闻周报》上公开发表《论共产党问题》、《北方青年的回响》等文章。文章把发展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歪曲成“有党派的狭

隘色彩”，是“民众运动中间的宗派主义”，是“反统一反民主的腐败思想的产物”，并声称“中共对于民众运动中的‘左倾’宗派，不能不负实际责任”；他们攻击北方局贯彻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以为国民政府的统一或纲纪可以不算一个问题”，并公然要求共产党“放弃苏维埃政治系统的独立”。

面对着徐芸书、黄刊等人掀起的这股右倾逆流，彭真对北平学生运动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他亲自到清华找了有关党员干部座谈，分析党同徐芸书、黄刊分歧的实质，并对徐芸书本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徐芸书因坚持自己的错误，后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刘少奇也发表了《论左派》、《“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等一系列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同右倾思潮进行斗争。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青年救国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对这场斗争也很关注。1937年5月，他在延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时，亲自接见了来自北平的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等代表。针对北平代表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一些不同意见和顾虑，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作了详细的回答。会后，中央还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少奇同志作了报告。强调了在新形势下，活动要从非法转到合法，要把群众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同时强调了抗战即将到来，华北的同志要准备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民先队员们积极投入到支援前线的战斗中去。7月28日晚，宋哲元退出平津，北平沦陷。学联和民先队的工作面临着新的局面。

十一、组织平津学生大撤退

在北平沦陷的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组织学生撤离北平。7月29日，黄敬在石驸马大街东口一家茶馆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的有李昌、黄诚、王文彬等人，布置了分头撤离北平的任务，指定到济南、保定、太原三地集合。之后，学委安子文又找学委和学联党团的蒋南翔、杨学诚、黄诚、王文彬，布置撤退。城内的一些民先队干部和队员，立即赶回清华，和杨学诚汇合，还把校警的枪也背上，准备从磨石口渡河去保定。途中发现永定河沿线日军已经布防，除了于光远、赵德尊、李友九等少数几个人冒险突过封锁线外，队伍只好折回，分散入城等待时机。后来，黄敬又把李昌等人找到，在他西城的家中碰了一次头，根据当时平津已经通车的情况，决定化装坐车到天津，再继续撤退。

在学生撤离到天津后，下一步怎么走，是学生领导干部必须考虑的问题。8月9日，蒋南翔、李昌和杨学诚、李哲人、王德、李华等同志，在叶方家里开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对撤退的方针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北上”，留在华北同农民一起打游击，一是“南下”发动群众，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日。李昌和蒋南翔各申述一种意见。李昌阐述的理由是：刚刚参加的全国党代会和白区工作会议的精神，就是号召华北爱国学生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对日作战。而且，民先队向来就是以促进抗战为宗旨，平时就作游击战训练，拿起枪杆投身抗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南翔同志也阐述了他主张南下的理由。这样，青年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北上奔赴抗日前

线，一部分南下继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这时，聚集在天津的学生越来越多，而津浦路交通又中断，只有组织学生乘船先到上海、青岛、烟台等地，然后才能转道去济南、太原和南方。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的组织下，平津学生分批结伴乘船离津。由于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学生们都云集济南，济南成为转往各地的第一站。学联和民先队的负责人在济南分手，刘导生、孙传文等人留在山东准备参加抗战，蒋南翔赴南京，李昌去太原。

十二、战斗在华北抗日前线

李昌等民先队员到了当时的华北抗战中心太原后，太原已建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和民先队临时总队部，这是先期从北平撤离出来的于光远等同志建立起来的。李昌到太原与于光远汇合后，立即投入了工作。他们依托太原地方队部负责人马寅等人开展输送干部的工作，同时和北方局彭真、林枫取得了联系。当贺龙、关向应率一二九师北上路过太原时，宋尔纯、饶斌、康世恩和王季青（后来是王震同志的夫人）随军奔赴战场；李俊明、徐达本等随彭真和黄敬到晋察冀和冀中；牛荫冠、纪毓秀和凌松如则早已参加了薄一波主持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另有一批干部输送到延安学习。民先总队的杨雨民和杨克冰等参加了杨秀峰教授组织的太行山师生游击队，李哲人后来到晋南开辟根据地去了。流亡同学会和民先队部成了输送干部的大兵站。

8月底，民先队总部派于光远到汉口，成立民先队总部办事处，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工作。9月，为了发动敌后人民、迅速壮大抗日力量，刘少奇和周恩来命李昌到南京去，动员民先队员和平津学生到前线参战。不久，南京形势恶化，国民党当局逮捕流亡同学会负责人，强制对他们军训。蒋南翔也由北方局调回了太原。

11月，太原沦陷，民先总队部随北方局撤退到临汾，这里又成立了流亡同学会。由蒋南翔主办《动员报》，蔡颀刻蜡版出版，传播抗战信息，宣传党的主张，影响很大，连国民党军人都争相购买阅读。北方局扬尚昆也为这个报纸写过社论。民先总队部由李昌、陆平、顾大川、丁浩川、夏英、徐明、赵志萱等一起负责，积极开展战地青年和群众工作，杨尚昆同志还特意向他们介绍了过去苏区农村青年和群众工作的经验。他们还创办了一个“动员剧团”，由金鹏举负责。剧团每到一处，群众派人远道迎送，常常演出后不让离开，情绪很是热烈。

当时，演剧是宣传抗战的有力形式。杨易辰、荣高棠、张瑞芳等组织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山东一带活动，影响很大，荣千祥因演抗日小调卖梨膏糖而出名，他也改名为荣高棠了。

在临汾的同学会和民先队总部，仍然是输送干部的兵站。李伟和薛公绰就是在这时被介绍到炮兵团的；留法学生吴子牧和江枫也是从这里走向敌后战场；清华的宋平和陈舜瑶，从这里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学习。当时，还发动了大批以民先队为骨干的青年学生，参加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文化工作。如清华的赵石等，就参加过汤恩伯的十三军战地服务团，还有很多人参加抗敌演剧队。只是后来都被赶出来或解散了。站住了脚的，即做出了较大贡献的，有在胡宗南第一军服务的熊向辉、陈忠经和申健等。

在此期间，很多人参加了新四军的工作。如黄诚，就在新四军政治部任秘书长，皖南事变中被俘，死于国民党集中营；后来杨学诚也在湖北乡下打游击，成为李先念、陈少敏为首的豫鄂边区创建人之一。

1938年2月，临汾又告失守。民先队总部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撤退到西安。5月上旬，李昌到延安汇报工作。当时由洛甫主持会议，参加的人有刘少奇、陈云、李富春、冯文彬等。李昌汇报民先队的工作后，刘少奇肯定了民先队这个先进青年的骨干组织在青年运动中的重大作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陈云同志兼书记，冯文彬为副书记，委员有冯文彬、胡乔木、宋一平、高郎山和李昌。

在西安，陕西国民党党部组织了“西北青年抗敌协会”和“西北青年抗敌先锋团”。但这两个团体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基调，对当地的“西北青年救国会”和来到这里的民先队员，采取排挤打击的手段，陕西省党部也对民先队部不予承认，民先队的工作首要的是在西北取得公开合法地位。但是，国民党不会容忍民先队在西北活动。5月中旬，国民党公开镇压民先队的活动，并企图逮捕李昌。在林伯渠的帮助下，李昌化装到了武汉。

到武汉后，李昌又参加以宋一平为书记的长江局青委，和于光远、黄华等一起工作，民先队总部也从西安迁到武汉。这时，总队部有李昌、于光远、丁浩川、殷参等。长江局书记王明，决定加强民先队，想以民先队和三青团结成青年抗日统一战线。湖北省也成立了民先队省队部，负责人有孙世实（队长）、韦君宜等人。

十三、在南方撒播革命火种

以蒋南翔为首的平津流亡学生到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后，迅速建立了流亡同学会，并力争公开合法。建立伊始，他们与南京学生代表走访了南京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及各界人士。国民党便为流亡学生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每天进行“一二·一”制式的训练。平津流亡同学会取得合法地位后，立即设立接待机关，与各地来南京的学生汇合，并与南京学联合作，组织宣传服务、慰劳伤兵等活动，很快在群众中产生了影响。国民党当局见此情况，便采取压制手段，强行改组了平津同学会，逮捕了负责人。后来，平津同学陆续分散，一部分参加“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团”，继续活跃在国统区。

“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团”是南京市委动员南京学联和平津流亡同学会组成的，团员60多人，北方同学占2/3，团长为董凌云。宣传团先后到老苏区黄安、黄冈及汉冶萍工人区开展工作。宣传团所到之处，常与当地共产党组织配合，作演讲和访问，与地方积极分子联系。有的甚至在地方上秘密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有的在发现积极分子后提供给地方培养发展。他们在这些地区工作所留下的影响，对我军以后在那里打游击、建立根据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仓皇迁往武汉。为了抵抗日寇的进攻，不得不表示依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3月，全国学联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参加了大会，中共方面有周恩来、邓颖超、徐特立，国民党一方有陈诚、黄琪翔、康泽、邵力子，无党派人士郭沫若也参加了。所以，这次大会影响很大。会后，各级的国民

党政府也组织了救亡团体。一时，武汉开放民运，群起救亡。在“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会上，平津学生和武汉“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建立了先进的青年组织——青年救国团。抗日救亡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了。

青年救国团的骨干很多都是平津学联的干部，他们与武汉学生骨干紧密合作，在长江局青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唱歌、演戏、办训练班、办刊物、办俱乐部、办印刷厂等一系列活动，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参加游击战争，还曾开办过小规模游击战训练班。

后来，全国学联、民先队、上海职业界所属的蚁社等救亡团体，陆续到达武汉，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但是，不久，国民党就开始了取缔救亡运动的行动了。1938年8月，国民党中央下令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和蚁社三个爱国团体，11月13日并在贵阳以召集训话为名把80几名民先队员逮捕，后来把为首的张益珊等5人枪毙。从而，进步活动又转入地下。

在这种局面下，在武汉参加救亡运动的学生按照党的指示，走向农村，拿起武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王文彬到山东建立根据地；朱穆之等由董必武派往鲁西北，参加范筑先部；杨学诚到鄂中担任特委书记，开辟了鄂中游击区；上海的王翰由周恩来派往鄂北任区党委书记，参加了建立鄂豫挺进纵队的工作；民先队湖北队长姜纪常到鄂豫皖边区从事组织工作；民先队队长李昌随同周恩来回延安。

1938年11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西北青年救国会召开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接着，又召开中央青年工作会议。会议鉴于国统区镇压抗日运动，西北青年救国会、民先队、青年救国团已难以存在，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积蓄革命力量，以待时机，而抗日民主根据地青年运动已从城市转入农村，由和平转入到武装斗争，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乡村青年，组织形式改为广泛的青年救国联合会和半武装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因此，学联、民先队和青年救国团等都完成了历史使命，而由新的各种形式的青年团体取而代之了。各青年团体共同组成了中华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冯文彬任主任，李昌任副主任。

“一二·九”运动的果实——学联和民先队，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一二·九”运动中诞生的民先队，对推动抗战和动员青年学生参战，实行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作用是巨大的。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曾多次提到过。1939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一二·九’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西北之时，这说明‘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红军北上抗日两件事的结合，这两件事帮助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1944年12月11日，刘少奇同志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九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青年学生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报告，报告指出：“‘一二·九’中革命学生所走过的道路，是一个模范。‘一二·九’时代的革命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平学生），已经指出了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农民结合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险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在爱国主义教育成为“主旋律”的今天，追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是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们的优良传统和爱国精神，树立起对马列主义和科

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学习，努力工作，为
振兴中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